

中国谚语集成





中国谚语集成

山西卷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山西卷》编辑委员会

中国 I S B N 中 心

中国谚语集成

山西卷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山西卷编辑委员会

中国 ISBN 中心出版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华龙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52.75 插页:15 字数:105.8 万

1997 年 10 月北京第一版 1997 年 10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7—5076—0125—0/J·120

定价: 137 元

数字资源
PDG

总 序

遵照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1984年联合签发的《关于编纂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通过省、地(市)、县各级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组织广大民间文学工作者及基层文化单位进行全面普查与采录、又经层层汇总选编，而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立卷的《中国谚语集成》，终于陆续编定出版问世了。这套集成的编纂出版，是为了辑录、保存我国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宝贵的谚语文化遗产，并使其在新时代起到实际应用和国际文化交流的作用。《中国谚语集成》和另外两套大型系列化民间文学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的联袂问世，是我国民族民间文学史上一项旷古未有的荟萃之举，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一项意义深远的建设工程。

中国谚语宝藏源远流长，浩如烟海。然而，它究竟“源”于何时，如何“流”长，却因鲜见确凿之依据而一语难详。先秦典籍援引谚语时，或称“古者有谚”，或曰“先人有言”，或索性指明所引乃“周谚”、“夏谚”。清人杜文澜的《古谣谚·凡例》说：“谣谚之兴，其始止发乎语言，未著于文字。”明确指出谚语源于文字之先。这一论断是十分正确的。从我们五十年代所掌握的尚处于原始公社末期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采风资料中，也可看到谚语同歌谣、神话、传说一样，在原始公社的人群中就已起根萌芽。可惜的是，我国文字产生前的谚语多已流失，无典籍可考。但从谚语历久不泯的这一基本规律却不难推论：现存于可考古籍中的古谚，当有不少是文字产生前的先民遗作。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学艺术源于劳动。作为直接反映人类劳动、生活和斗争经验总结的文艺形式之一，谚语自然更不例外。当然，在人类的劳动能力和对外界事物的认识水平

都还十分幼稚的原始社会中,谚语是难以成形的。谚语的成形有赖于人类的劳动生产、生活经验积累到一定的高度,同时也有赖于抽象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发展成熟到一定的高度。当先民具备了这些方面的条件,为了相依为命,交流、传授各自的点滴生产、生活心得,他们便开始逐步将那些行之有效且屡试不爽的经验之谈,一次再次地概括提炼为易讲、易传的短言句式。你讲我讲,久而久之,这种短言句式便渐趋定型,成了所谓“谚语”。在我国先秦古籍中,生产谚就位居古谚之首。诸如《易经》的“士刳羊无血,女承筐无实”、《诗经》的“朝跻于西,崇朝其雨”等,出自商周奴隶农牧劳动和天气占验的生产谚,几乎俯拾即是。

谚语发端于劳动,但也并不止于反映劳动生产。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谚语逐步由认识自然,总结劳动经验,而广泛涉足社会生活,涉足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各种社会矛盾。这些后起于生产谚的其它谚语,来源更庞杂、内容更丰富。为了便于表述,我们权且统称之为“社会谚”。社会谚同生产谚一样,依然是人民群众的口头集体创作。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人民群众把自己的喜怒哀乐之情、衣食住行之事,统统倾注于谚海,举凡事理德行、时政社交、日常生活,以至风土人情,都不乏精妙之作。这些谚语的总和,反映了劳动人民全部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历史经验,成为世代代人民群众认识生活的教材、陶冶性情的艺珍、斗争自强的武器,以至改造社会的指南。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阶级社会中,当谚海向广袤的社会生活不断扩展时,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两种文化”现象。由于剥削阶级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无不与劳动人民形成截然的对立,为了维护并散布其自身的思想,势必也极力设法利用谚语这一具有奇妙交际效应的艺术语言。他们或是扭曲谚语的本旨,随心所欲地“采以为谈”;或是偷梁换柱地对谚语进行篡改和伪作,把剥削阶级的种种思想观念和处世哲学深深地渗透于谚海之中。鲁迅曾指出:“粗略的一想,谚语固然好像一时代一国民的意思的结晶,但其实,却不过是一部分的人们的意思。”他同时剖析“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一谚说,“这乃是被压迫者们的格言,教人要奉公,纳税,输捐,安分,不可怠慢,不可不平,尤其是不要管闲事;而压迫者是不算在内的”。寥寥数语,便十分明白地揭示出了谚语的阶级性。

我们探讨谚语源流,既要剖析谚海的“两种文化”现象,还需研究谚海海域的消长变迁。谚语既是一种口头传承,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必然会不断出现变异、增长和消亡现象。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谚语也不例外。从谚海整体看,总的趋势是与日俱“长”的;而从各个局部“海域”看,却是从不间断地在时长时消。所谓“时长”,主要是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视野的日趋开阔和经验、认识的日益更新,不断有大量新的谚语涌现出来,致使辽阔的谚海日渐加深加宽。所谓“时消”,主要是指出现在某一历史时代的一些谚语,或因其所反映的事态已时过境迁,或因其所使用的语言已发生变异,不再为人们所口传、引用,因而又总会随之在谚海中悄然消逝。不难看出,正是这种时长时消的规律,在影响和制约着谚海这一“海域”,使之始终处于永不干涸而又充满生机的流动状态之中。

本《集成》编纂方案指出：“编谚语集成，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谚语。”关于谚语的界说，乃是一个自古而今众说纷纭的问题。我国古代见诸书面的谚语界说不胜枚举。其中影响较大者有：《尚书》的“俚语曰谚”；《礼记》释文“谚，俗语也”；《国语》韦注“谚，俗之善谣也”；《汉书》颜注“谚，俗所传言也”；《文心雕龙》的“谚者，直言也”，《说文解字注》的“凡经传所称之谚，无非前代故训”；及《古谣谚·凡例》的“谣训徒歌”、“谚训传言”，二者“对文则异，散文则通，可以彼此互训”，等等。另有一些典籍，还对谚语以里谚、俚谚、俗谚、鄙谚、野谚、口谚、里语、鄙语、俗语、古话、常言等相称。这些界说与称谓，各执其理，各遣其词，但大多流于片面，偏重管窥谚语的俗传性特点。唯“前代故训”一说，倒多少点出了谚语的实质。

本世纪二十年代初，郭绍虞先生深入谚语若干本质特点，在《谚语的研究》中说：“谚是人的实际经验之结果，而用美的言词以表现者，于日常谈话可以公然使用，而规定人的行为之言语。”半个多世纪以来，谚家群起，界说更丰，但迄今也未能定于一尊。可喜的是，这些界说业已广涉谚语实质的方方面面，大体勾勒出了谚语作为科学字眼的涵义和范畴。

在此情况下，博采众长，为谚语草拟一个较为妥当的定义，应该说是可能的；由于要编《集成》，确定一种协调工作的界说，无疑也有必要。据此，我们便在《集成》编纂方案中权且作了这样的界定：“谚语是民间集体创作、广为口传、言简意赅并较为定型的艺术语句，是民众丰富智慧和普遍经验的规律性总结。”这个定义，未必尽善尽美，但实践表明，用它协调全国谚语集成工作，是基本可行的。当然，作为定义它只原则厘定了谚语的基本范围。为求进一步地理解和掌握它的实质，我们还须由此剖析谚语的基本特征。

谚语有哪些基本特征呢？

从内容看，谚语首先具有经验性。它或源于直接感知，或兼含间接推理；或反映成功，或总结失败；无不是体验或观念的经验性结晶。谚语还富有哲理性。它总是升华带规律性的经验，洞察事物的本质，从而能够十分准确地表达出某种深邃而又闪光的见解，具有令人折服的说理性和训诫性。

从形式看，谚语既是人民群众的口头创作，则无不具有通俗、上口的口语性特征。这一点甚至成为我们辨别谚与非谚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谚语又总是以最简约的形式，蕴涵最渊博的内容，表现出非凡的精练性。任何复杂纷繁的事物、抽象深奥的道理，一旦进入谚海便出奇地精练。谚语还以其高度的艺术性而被誉为“浓缩的诗”。在语言里，它既是特殊表达成份，又是艺术表达方式。它广用辞格，巧织句式，节奏鲜明，音韵铿锵；常见的形式是由两句构成，也有一句、三句、四句的；在技巧上，谚语还常常运用民间诗歌特有的排比、对偶、

比喻、层递、倒装、设问等多种修辞手法，以增强其艺术上的感染力和论理中的说服力。

这里简略提到的只是谚语在内容、形式上所通常表现出来的一些基本特征。为了厘定谚语的界限，同时还须以此为依据，去细辨谚语和它的近邻们的区别。编纂方案规定：“本《集成》只收谚语，不收俗语、格言、成语、歇后语。”方案所列“不收”诸语，便是易与谚语混淆的“近邻”。

在所有近邻中，俗语最易与谚语相混。这固然同谚语历来多和广义的俗语称谓混用有关，更因两者确实相距太近所致。我们所谓俗语，是指狭义俗语，即对于某种思想和社会生活进行直接间接形象化描述的定型语句。两者突出的区别是：谚语旨在推断某条道理或经验，而俗语则大多描述某种情状或性质；谚语必是完整的句子，而俗语则不乏短语式的“残句”，多需借助上下文，庶几完整句意。

谚语与格言一般不难区分。谚语系群众集体创作，查无作者，格言则多为名人“可为法式”的语录，有作者可查；谚语富口语特色，使用时可易字句，格言书面语特色较浓，且一字也不可改动。

谚语与成语可做多方面对比：谚语是整句，可单用；而成语多是词组或短语，只能充当句中的“词”。谚语只大体定型，使用时可小有变异；成语则非常定型，一般不容擅改。从风格特色看，谚语以俗为本，口语味儿浓；成语则文墨味儿重，多作书面引用。

在多数情况下，谚语与歇后语界限分明。谚语侧重言事言理，歇后语侧重喻形喻情；谚语主谓语浑然一体，歇后语喻解体若即若离，讲述时可以乃至必须有较长的停歇；谚语的“有效成份”蓄于全句，歇后语的“有效成份”只在后半句（解体）；谚语独立成句，歇后语多作句子成分，或依附某语言环境。

必须指出的是，谚语和它上述近邻虽可类分，但它们之间也有交叉现象，有的却也难以截然断面，因为它们毕竟共属一个语言大家族——熟语。它们在来源、语义、表达、流传等某一或某些方面，维系着或远或近、或浅或深的“血缘”，甚至难免“混血”跨类。我们既反对不分界限，又承认谚语和它的近邻有跨类交叉现象，例如：“满招损，谦受益”，既是格言，又是谚语；“漫天要价，落地还钱”，既是俗语，又是谚语；“哀兵必胜”，既是成语，又是谚语；“单面锣打不响”，既是歇后语，又是谚语，这类相互交叉的作品，我们认为也可入《谚语集成》。

三

谚语，被誉为民间的知识总汇和大百科全书，蕴蓄着人类社会广博的智慧和经验。对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数千年文明史的谚海大国来说，积累和弘扬谚语文化，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早在一千八百年前,东汉的崔寔就首先辑当时流行于世的农谚作《四民月令》,成为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谚语采辑家。嗣后,又有三国吴陆玑著《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宋陈旉著《农书》、元娄元礼著《田家五行》、明徐光启著《农政全书》,皆循崔寔足迹悉心采集农牧渔副生产谚。全面发掘、辑录包括生产谚在内的各种谚语,一般认为当始于宋。宋人龚颐正的《释常谈》、周守忠的《古今谚》,系现存我国书海的最早的谚语大观。此后,明人杨升庵的《古今谚》、清人杜文澜的《古谣谚》、曾廷枚的《古谚谭》,以及近人李鉴堂的《俗语考原》、史襄哉的《中华谚海》、朱雨尊的《民间谚语全集》,等等,都是各自时代积累弘扬谚语文化的杰出成果。

值得瞩目的是,历史上对于谚语遗产的传承光大,并不仅限于发掘汇辑成书,更大量的,还表现在连楹充栋的各种典籍的广泛采用。就连对民间口头创作深怀阶级偏见的高贤雅士,有时也不得不屈尊俯就。《文心雕龙·书记》说,“夫文词鄙俚,莫过于谚,而圣贤诗书,采以为谈”,便是明证。事实也的确如此。先秦典籍保存的大批古谚,诸如《国语》的“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战国策》的“宁为鸡口,毋为牛后”、《韩非子》的“远水难救近火,远亲不如近邻”等,历时两三千年,至今仍闪耀着华夏先人聪明才智的奇辉。现在仍活在人们口头上的“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忠言逆耳利于行,毒(今作良)药苦口利于病”等名谚,是《史记》流传于世的。唐宋以来,随着市民文学的蓬勃兴起,从唐人传奇、宋人平话,到元代杂剧、明清小说,被采撷入墨的谚语更是数不胜数。例如,单是《红楼梦》前八十回所引谚语,即达数百则之多。

“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喜闻乐用的“谣谚”,引起了当时文化界的特别关注。除继续大量采汇成书和引入写作外,郭绍虞、曹伯韩、钟敬文、黎锦熙、朱介凡等不少学者,纷纷起而著文立说,揭开了我国谚语现代研究的序幕。据曹伯韩先生当时统计,短短一二十年间,各省出版的谚语专著,即不下三四十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谚语的发掘与研究步入了崭新的时代。就发掘成书而论,从单类集子,到综合选编;从一般介绍,到分类诠释;从古谚寻源,到今谚集锦;从汉族谚语概观,到少数民族作品合璧,不断有新集问世。就理论研讨而言,在有关谚语的搜集整理、界说分类、内容缕析、艺术探讨、语言寻踪,以至国内外谚语的比较研究等领域中,众多选题,有的已经成书,有的已始于谚语学者的探索笔触。在此期间,公开出版的专著和类书,少说也逾百余;见诸报刊的零星论文,更是数以千计。

古往今来,我国谚语宝藏业已展开的发掘和研究,成果喜人。然而,我们也无须讳言,这些已有的发掘与研究,较之我国谚语宝藏的实际储量,较之我国谚语研究的应有水平,较之世界谚语研究的发展形势,毕竟还很有限,或曰差距不小。全面发掘谚语文化遗产,致力提高谚语研究水平,进而卓然确立“中国谚语学”的光荣使命,历史地落到了当代中国谚语工作者的双肩。

有鉴于此,早在八十年代之初,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就积极酝酿并倡议在全面普查、采集的基础上,编纂出版包括《中国谚语集成》在内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丛书。这一倡议,得到文化部和国家民委的高度重视与鼎力支持。1984年5月,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正式联合签发了关于编纂出版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通知》;接着便组织班子,制订方案,在全国范围展开了发掘、编纂谚语集成的宏大工程。

在1986年5月召开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第三次工作会议上,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正式宣布接纳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列为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

四

《中国谚语集成》以广集我国谚语之大成为己任,自1984年下达关于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通知》之后,《集成》工作通过全国省、地、县各级文化部门和《集成》机构,即纷纷培训骨干,发动群众,组织了全国性的谚语大普查、大采集。在普查采集过程中,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从草原林海,到边寨渔村,无不遍布谚语工作者的辛劳足迹。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谚语的搜集犹如大海捞针,需要一点一滴、一句一条地积累,其工程之浩大、任务之艰巨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正是靠着众多同志默默无闻的埋头苦干和献身精神,终为《集成》的编纂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历史将永远记下他们的功绩。集成工作开展以来,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各地工作不甚平衡,但就普查面之广、采集量之多而言,已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标。编纂《方案》规定,“原则上以现今流传于世的作品为界,存于古籍而未见流传者,一般不予入书。”通过此次普查采集,全国“现今流传于世”的谚语,包括那些确已在口头流传而为群众所认可的新谚语,大体已经掌握。真正集我国数千年岁月、数十个民族谚语文化之大成以编纂成书,这在过去时代,断不可能做到,甚至连想也不敢想。这也只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有可能完成的大业。

《中国谚语集成》的编纂与出版,是在全国范围内囊括普查、采集、翻译(部分少数民族谚)、鉴别、遴选、分类、编排,以至印制出版等项内容的浩大的系统工程。编纂《方案》总地要求,这项工程“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的原则,真实、全面、准确地反映我国各民族谚语创作和流传的面貌,体现八十年代我国对民间谚语搜集、整理、翻译、研究的水平及成果”。

根据编纂《方案》的总体要求,本《集成》把确定一个明确的编辑指导方针,放在了一切工作的首位。由于谚海存在“两种文化”现象,加之许多谚条流传久远,时空跨度甚大,作为历史的产物,不能不受到时代的、思想观念上的局限,特别是受到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与干扰。因此,其中有些作品难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封建的、迷信的、宿命论的

观念。这就要求我们在选收作品时,必须始终坚持批判地继承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认真区别对待。凡属内容反动、格调低劣、对人民群众有害无益的作品,一律剔除不收。当然,我们也同时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出发,始终注意把不同时代产生的作品,放回到各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去进行分析、观察,并从哲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多方位地去审评它们的功能与价值,而力求避免用今人的眼光去机械地、简单化地苛求和否定前人之作。因此,凡属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揭示作用和认识价值的作品,尽管它们在现实生活中已失去借鉴意义,我们依然予以收录。对于一些因受到历史的、认识上的局限,而带有狭隘性、片面性,在事理的分析上已显得陈旧过时的作品,只要它们尚属无害于民的传统佳作,我们也适当保留下来,以留给读者去批判地继承。此外,对于语言艺术上的特殊表达,诸如“母勤女不懒,父懒儿不勤”、“宁养败子,不养呆子”一类因强调某一点而故意极而言之作品,亦不简单视之为粗伪糟粕,动辄一笔删汰。总之,既注重社会效益,又坚持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二者兼顾,审慎筛选,是本《集成》在编纂过程中贯彻始终的编辑指导方针。

根据编纂《方案》的总体要求,本《集成》对入选的作品严格贯彻“三性”原则。所谓“三性”,即一讲“科学性”,务求采集、整理、翻译、鉴别以至编排等各个环节,都具有忠实性、准确性,反对无视科学的随意性;二讲“全面性”,务求全书所收作品,基本囊括全国现今五十六个民族的各类谚语,包括富有实用和研究价值的异文变体;三讲“代表性”,务求入书作品业已经久流传,有较强延续性和一定覆盖面,在本地区、本民族中有一定的影响。凡属乡土味较浓之本地区代表作,有多少收多少;跨省的“通用”谚,也择优入书。这三条原则,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既明确了《集成》的学术准绳,又提供了协调全国编纂工作的统一规范,以力求保证本书应有的质量。

根据编纂《方案》的总体要求,本《集成》按内容分类方式建立自己的编辑体系。谚海的容蕴繁杂,按内容进行分类,虽有相当的难度,且迄今未见公认的内容分类范本,但为了增强本《集成》的可读性与可利用性,我们仍坚持采用了按内容分类体系。要求作品归类时各就各位,依类相从,并照顾各类作品内在的联系,以供查阅方便。我们试将入书谚语的内容分作“大、中、小”三个层次,进而在各个层次中按内容立目划类。要求全书各卷的类别“大一统,小变通”,即:大层类别各卷大同;中层类别各卷允许有若干增减调整;小层类别则可根据各个不同地区的谚条构成情况,灵活听便。小类中具体排列谚条时,各卷更可自酌内容而巧为编织,但求井然有序。尽管这样的分类编排方式还属一种尝试,偏颇不当之处自是难免,目的却是期望能用一条透射内容的视线,把有如一颗颗微雕艺珠的谚语,有层次、有条理地贯串起来,既使全书在宏观上自成系统,又让各卷在分类上充分展示各地谚语宝藏的百态千姿;既有利于不同文化水平、多种生活阅历的各界读者随意检索,又方便诸多学科的研究家们从中摘取资料、进行研究。

《中国谚语集成》凡三十一卷(台湾卷暂缺),自 1990 年起一卷接一卷地同读者见面。它采自民间,又要带着油墨的馨香回到民间去。作为它的编纂者——我们及全国谚语集成工作者,对于世世代代中华儿女智慧和经验的宏伟结晶的成书问世,无不满怀喜悦之情。然而,正如谚语“瓜无滚圆,人无十全”所说,天下未见有十全十美之事。《中国谚语集成》的编纂工作,限于主、客观诸多条件的不足,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罅漏,令人喜中隐忧。我们殷切期望广大读者和专家不吝赐正。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〇年一月于北京

凡 例

1、《中国谚语集成·山西卷》是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有关文件精神，本着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的原则编选的。

2、本卷所收谚语约2万余条。主要是从1985年以来，由山西省各地、市、县(市)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组织力量，进行广泛普查采录的15万条谚语资料中反复筛选而来。同时也采用了广大民间文学爱好者提供的部分资料。本卷所收谚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山西省各个历史时期谚语创作、流传及分布的概貌；反映了近几年来山西省谚语采集整理的成果。

3、本卷谚语按内容分类编排，共12类。依次为：事理谚、修养谚、社交谚、时政谚、生活谚、家庭谚、风土谚、自然谚、时令谚、农林谚、工商谚、文教谚；大类之下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为若干中类、小类；小类之中以逻辑顺序聚串。为了避免重复，根据谚语内容侧重和条目的均衡，对于复句谚归在一个类。“信仰”中有宿命谚和破除迷信的新谚，为客观地反映民间信仰，故收入卷中，供研究之用。

4、本卷中多数谚语为广泛流传，无需标明搜集地。对于有一定地域特点的自然、时令、农林、风土等类中的谚语，本卷视需要标明其搜集地。

5、为便于读者理解、使用谚语，本卷对方言、典故、民俗、特殊用语等项内容，在其第一次出现时作了注释。注释统一在当页右下角。限于篇幅，本卷对同一谚语的部分异文，用注释的形式录于当页。

6、因在搜集谚语时，重复记录者颇多，不便一一随条署名。故在卷末附谚语搜集提供者一览表，以备查考。

前言

《中国谚语集成·山西卷》是山西省民间谚语的总汇,是山西省历代人民集体智慧与实践经验的结晶,也是山西各族人民语言艺术的精华。

山西,因地处太行山之西而得名,亦称山右;春秋时期地属晋国,故简称晋;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因而又称三晋;山西,位居黄河之东,秦、汉、唐、宋时曾先后设河东郡、河东道、河东路等,历史上又称河东;元代称河东山西道,明代改称山西行中书省,旋改称山西承宣布政使司;清代设置山西省,其名沿袭至今。

山西省地处华北平原以西、黄土高原东缘。东倚太行山与河北相连,西隔黄河与陕西相望,南与河南相邻,北以长城与内蒙古自治区相接。全境位于北纬 $34^{\circ}36'$ — $40^{\circ}44'$,东经 $111^{\circ}15'$ — $114^{\circ}32'$ 。南北长约550公里,东西宽约230公里。全省面积15.6万平方公里。襟山带河,地势险要,而交通方便,经济发达。素有“表里山河,形势完固”之称,历来为商贸来往的大道,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地。《金史·完颜伯嘉传》中载有一句民谚:“不得河东不雄”。原文这样写道:伯嘉上书谏曰:“中原之有河东,如人之有肩背。古人云,不得河东不雄。万一失之,恐未易取也。”于此可见,山西地理位置之重要。

山西历史悠久,为我国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远在170余万年以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山西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全省目前已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如芮城匭河、西侯度等有100余处。新石器文化遗址更是遍布全省。相传后稷教民稼穡于稷山,嫫祖教民养蚕于夏县;历史传说中的“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在山西晋南一带;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神话故事也都与山西有关。

山西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以勤劳智慧的双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古往今来遗留下丰富的文物古迹。云冈石窟是全国三大石窟群之一,五台山为我国四大佛教圣地之首,应县木塔是我国最古、最高的一座木塔式建筑,恒山悬空寺、洪洞广胜寺、太原晋祠、隰县小西天、芮城永乐宫、解州关帝庙、永济普救寺等等,都是驰名中外的历史文化瑰宝,也是吸引着海内外游客的旅游胜地。

山西2700万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抗日战争时期,在山西创建有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三大革命根据地和太行、太岳两个军分区。山西的山山水水浸透着先烈们的热血。

山西的每一条山脉、河流与山西人民一样，为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过重大贡献。八路军总部驻扎在山西武乡，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革命家都在山西留下了光辉的足迹，至今仍流传着许多生动感人的民间文学作品。

山西境内山川纵横，丘陵起伏，是一个被黄土覆盖的山地高原。地质结构复杂，地层较为丰富。成矿地质条件优越，形成了山西丰富多彩的矿产资源，是我国重要的煤炭能源基地之一。谚语说得好：“山西不缺烧，住在煤旮旯”。山西煤炭的蕴藏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全省 100 余县市中有 94 个县市产煤。因而历来被誉为“乌金世界”、“煤炭之乡”。

如果说，煤炭是山西的物质财富宝藏，那么，民间文学则是山西丰富的精神财富的宝藏。浩如烟海的民间谚语，则是民间文学这份取之不尽的宝藏中闪闪发光的一串串珍珠。

山西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与生产斗争中，口耳相承，总结传授生活与生产的经验教训，创造并积累了大量的民间谚语。

早在战国时期，出生在山西的伟大思想家荀况在他的著作中就引用了许多民间谚语。比如《劝学》篇中的“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后来演化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生于水而寒于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再如《大略》篇中的“流言止于智者”，《王制》篇中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等。

《新唐书·食货志》与《全唐诗》中均载有“古无门匠墓”这条饱含黄河船工血泪的民谚。《全唐诗》中这样写道：“唐时漕经底柱入三门，每雇平陆人为门匠，执标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覆者及半。故谚云云。谓皆溺死也。”至今山西平陆三门乡一带仍流传着“门匠无墓”的谚语与故事。说的是三门峡黄河中古有三门山，水流湍急，中有巨石称砥柱，河水至此，分流三股，南为鬼门，中为神门，北为人门，舟行此处，频频倾覆，即使熟悉水性的门匠，也难逃葬身鱼腹的悲惨命运，陆上没有他们的墓地。解放以后，此处建成三门峡水库，黄河船工的苦难一去不返，而此谚语却仍在流传。

魏晋时代的裴秀，山西闻喜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地理学家，著有《禹贡地理图》十八篇。在《晋书·裴秀传》中记载：“时人为之语曰：后进领袖有裴秀。”这条谚语无疑产生于民间口头，而又借助古籍更为流传。

有些谚语，在民间流传很久，却在古籍中难以找到。比如“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诊多”，生动地说明了实践的重要性。谚语来自实践。古来如此，追溯得再早一些，我国殷商时期的虞地圣人洹（即今山西平陆县）曾经出过一个圣人，名叫傅说（音 yuè）。他原是一名奴隶，在修路劳动中探索出一种省工、省时、省力的好办法，即用两片木板相夹，中间填上湿土，然后捣实，层层加高，筑为土墙，从而解决了大水常冲塌路基的问题。这一技术，为以后的修筑长城、城堡、民间垒墙创造了好的方法。至今 3000 多年，农村仍在使用这种方法垒墙。商帝武丁在私访中发现了这个人材，破格提拔他作了宰相。“打墙板，上下翻”的谚语，就是从那时逐渐产生而流传下来。此语原意是指版筑技术，后来人们又将其理解为世事沧

桑,循环变化,于是有人续了一句“奴隶能把宰相干”。

山西谚语内容丰富多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自然、军事、宗教、民族,及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和各行各业。真可谓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它深刻地阐述了生活的哲理、斗争的方法,生动地反映了人们的实践经验,发人深省,耐人寻味,不愧为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担水看湿道,拉煤看黑道”、“河有两岸,事有两面”、“斟出来才是酒,做出来才是手”等,句句是朴实无华的至理名言。

山西是一个农业大省。农林谚、自然谚与时令谚的数量相当可观。一年中的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个节气,农林牧副渔业,时时处处都有谚语。“春打六九头,遍地走耕牛”、“春耕深一寸,顶上一层粪”、“种在春犁上,收在夏锄上”、“伏天不肯晒背皮,十冬腊月饿肚皮”、“秋天弯弯腰,冬天不缺烧”、“冬天比粪堆,来年比粮堆”等等,在全省广为流传,家喻户晓。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一些表现季节性的谚语中又反映出不同的地域特色和适用范围。比如“清明前后,安瓜点豆”(晋南)、“谷雨前后,种瓜点豆”(太原)、“小满前后,种瓜点豆”(左云)、“白露种四山,秋分种平川”(翼城)、“秋分麦入土”(屯留)、“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临汾)、“麦到芒种谷到秋,豆子寒露用镰钩”(运城地区)、“小满麦挑旗,芒种麦秀齐”(吕梁地区)。

谚语是人民群众集体创作的口头文学作品,经过千百万年的口耳相承、辗转流传,不断加工润色而日臻完美。然而由于历史、时代、阶级的局限,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本集成在编选中既注意到选择健康积极的内容,同时也适当地保留了一些此类谚语,供作参阅、研究资料。

随着历史的发展,谚语的内容也在不断地变化。一部分古谚语逐渐消失,而大量的新谚语应运而生。比如“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村干部”、“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不怕老天旱,就怕政策变”、“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等等即是近些年中涌现的谚语。

在长期的流传中,有些谚语发生了讹传现象,本集成在编选时都注意做了订正。比如“跟上龙王吃河鱼”,应为“跟上龙王吃贺雨”,“贺雨”是指祈雨得雨后的贡品。再如“舍不得孩子打不住狼”,应为“舍不得鞋子打不住狼”,“鞋”,晋南土音 hái,意指舍得磨破鞋子(谓多跑山路)才能抓住野狼。

山西历史上有许多人在收集、整理、研究谚语,尤其是农谚。比如清代的祁寓藻(1793—1866年),字叔颖,山西寿阳平舒人。清代嘉庆十九年(1814年)中进士,历任兵部尚书等职。他自幼敏学,后益博大精深,曾教过道光、咸丰、同治三代皇帝,民间有“三代帝王师”之美誉。本卷附录了祁寓藻编的《马首农言》农谚部分。

民国年间,山西河津人刘遵九(1882—1948年)也十分重视收集农谚。他从山西农林学堂毕业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曾任山西农业专门学校校长。他曾编著过一本《山西农家俚言浅解》,全书汇集了山西各地区的农林、水利、自然、气象等数百条谚语。分

类作出相当科学的注解,并注明流传地点。

1949年后,民间文艺工作者和有关部门对谚语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更加重视,成果累累。

1959年农业出版社出版的《宁华堂牧羊经验》(吕效吾等编著)一书中附录了百余条畜牧养羊及气象谚语,生动地体现了劳动人民口头创作与生产实践的紧密结合。宁华堂(1910—1973年)山西陵川人。50年代被山西农学院特聘为大学教授,以一个牧羊工登上了大学讲台。他收集并运用的“先坏后好,越吃越饱”、“肥母出胖羔”等谚语,我们直接选录入本卷中。

山西丰富多彩的谚语不仅广泛地运用在人们日常生活、社会交际中,而且大量地反映在山西作家的作品中。著名的语言大师、号称“铁笔圣手”的“山药蛋”派代表赵树理,他十分热爱谚语,并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30年代,赵树理在沁水与太谷任教时,都曾向学生布置过收集谚语的假期作业。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十分贴切、巧妙地运用了许多谚语,使作品产生了引人入胜的魅力。用于说理的提高了语言的说服力,比如“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三里湾》)、“理怕众人秤”(《十里店》)、“捉贼要赃,捉奸要双”(《小二黑结婚》);用于记述的增强了语言的概括力,比如“新官上任,不摸秉性”(《锻炼锻炼》)、“胜败乃兵家常”(《三关排宴》)、“什么样的老母下什么样的儿”(《登记》);用于刻画人物形象的增强了语言的感染力,比如“烧的纸多,惹的鬼多”(《老定额》)、“狗仗人势”(《邪不压正》)、“树倒猢猻散”(《石不烂赶车》)。在他的作品中,几乎每篇都能看到一串串的谚语,读起来生动活泼、妙趣横生,在文中起到了画龙点睛和锦上添花的修辞作用。谚语使文学作品增色,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

由于我们的认识水平有限、时间比较匆促,编辑工作中难免有挂一漏万、归类不当、注释欠妥以及不尽如人意之处。敬请专家与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山西卷编委会

1993年4月于太原

目 录

凡例	(1)	惜时	(90)
前言	(1)	谨慎	(94)
事理谗	(1)	谦虚	(94)
说理	(3)	谨慎	(100)
重理	(3)	律己	(103)
有理	(7)	改错	(106)
常理	(9)	社交谗	(109)
属性	(9)	社群	(111)
关联	(16)	群体	(111)
因果	(20)	个人	(116)
条件	(23)	团结	(118)
限度	(25)	交游	(121)
演变	(28)	重情	(121)
判断	(29)	择友	(122)
喻理	(30)	结交	(124)
对比	(37)	应酬	(130)
两面	(37)	礼教	(130)
相对	(44)	人情	(133)
得失	(48)	待客	(134)
知行	(50)	做客	(136)
见识	(50)	处世	(138)
躬行	(52)	处事	(138)
修养谗	(59)	做人	(143)
志向	(61)	忍让	(148)
胆识	(66)	人心	(152)
才智	(70)	警世	(155)
品行	(76)	钱财	(157)
求知	(83)	言谈	(163)